

# 李提摩太、数字与晚清的 知识侨易

Timothy Richard, Numbers, and Knowledge  
Qiao-Yi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王 雨  
WANG Yu

## 作者简介

王雨，澳门大学历史系研究助理教授。

###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WANG Yu, research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Macau.

Email: ywang@um.edu.mo

##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how numbers became a crucial way of thinking in the modern era and the vital roles they played in the production and circulation of knowledge in the age of imperialism. Specifically, this article examines Timothy Richard's question of and answer to "How one preaches to a million" from the 1880s to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This article showcases how Richard, in search for a more effective way of preaching, located a new discourse to describe and reconstruct reality through numbers, and within the discourse assigned Christianity a paramount position. This article further points out that such a process is also one of knowledge Qiao-Yi, during which the religious beliefs Richard had in mind underwent significant transformation and travelled in the network of information with a newly obtained face. In doing so, this article unpacks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igion and modern knowledge system in semi-colonial societies such as the *fin de siècle* China.

**Keywords:** Timothy Richard, numbers, knowledge Qiao-Yi, religion, imperialism

## 引言

1907年，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在自己的新书引言中写道：“这本书记录了能够让一名传教士承担十名甚至百名传教士工作的科学的传教法则。”作者对数字的修辞与使用吸引了许多读者的目光。在书衣上，一位苏格兰教授为其写下荐词，强调这本书“关注到了中国的人口在以每年300万的速度增长，而新教传教士每年只能获得大概25000名信徒”，并进一步发问：“在这样的差距下，遍布福音的目标何以能够实现？”甚至这部著作的书名之中就包含了一个极大的数字——《中国的百万皈依》（*Conversion by the Million in China*）。

本文考察的一个基本问题是，数字如何在近代成为一种思考方式，以及它在帝国主义时代的知识生成与流动当中究竟扮演了什么作用。近年来，学界对晚清以降知识生成与流动的研究日渐丰富，成果大多以翻译为中心，探讨知识流动过程中的权力关系<sup>①</sup>。如何伟亚（James L. Hevia）所言，知识的形式不仅包括商业报告、博物学以及人类行为的记录，还包括了我们平常较少关注、但同样重要的地图、表格和统计数字。由于这些铭写符号不可改变，在帝国网络中被浏览、复制和转移时依然保持了高度的稳定性，从而为信息的进一步叠加和压缩提供条件。如此便形成了作为帝国档案的知识（权力）的来源。在这种机制之下，“中国”一词在19世纪末代表的已是一整套新的“知识”与客观“事实”了。<sup>②</sup>

<sup>①</sup> Lydia H. Liu, *The Clash of Empires: The Invention of China in Modern World Making*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Li Chen, *Chinese Law in Imperial Eyes: Sovereignty, Justice, and Transcultural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6).

<sup>②</sup> 何伟亚：《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刘天路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34-136页。[James L. Hevia, *English Lessons: the Pedagogy of Imperialism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trans. LIU Tianlu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07), 134-136.]

受此启发，本文以《中国的百万皈依》为中心，讨论数字如何出现并构成了该“知识”的一部分。<sup>①</sup>同时，围绕李提摩太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数字的痴迷，甚至是“滥用”（abuse），本文认为李提摩太走向数字不仅仅是出于“救赎”中国的考量，还与探索走出传教事业危机的道路密切相关。

本文借鉴了叶隽的知识侨易理论，<sup>②</sup>视李提摩太的宗教理念和传教方式为知识侨易的主体，透过两者的变化来讨论数字如何作为一种新的知识形式出现的。在此基础之上，笔者还将李提摩太对二者的构想放置于以广学会为代表的机构群体之内，分析这些机构如何在清帝国之内协同联动，借助中国既有的政治运行制度和行政机构，建立据点，通过出版、复制与流通等一系列知识侨易的形式，有组织地鼓励与引导包括基督教教义在内的西学知识的流通。最后，笔者指出，正是在知识侨易的过程中，数字上升为李提摩太思考和重构现实世界的

<sup>①</sup> 值得一提的是，现行侯林莉译李提摩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中，《中国的百万皈依》被译为了《万民归宗》，表面上看二者似乎差别不大，但恰恰遮盖掉了李提摩太对百万一词的痴迷，使一整条关于数字的知识脉络显得愈发晦暗不明。见李提摩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第177-178页。

<sup>②</sup> 叶隽以“物质位移”与“精神质变”这组概念为核心，围绕个体精英实现知识生产与流动构建出一套宏大的阐释理论。尤其重要的是，叶隽将个体置于交叉网络之中，认为“个体仿佛是多线行道的交叉点”，并由此观察个体如何在空间移动过程中与各种思想流派之间的激荡与互动。与此同时，在交叉网络之中游走的个体又处于“器物—制度—文化”的立体结构内部，进而通过个体折射出整体性文明的一些特质。参见叶隽：《变创与渐常：侨易学的观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理论旅行”抑或“观念侨易”：以萨义德与卢卡奇为中心的讨论》，载《侨易》（第一辑），叶隽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63页；叶隽：《“典籍旅行”与“知识侨易”——两册〈永乐大典〉迁史中表现出的中德学者交谊及其学术兴趣》，载《国际汉学》，2016年第2期，第154-164页。[Concerning the theory of Qiao-Yi, please see YE Jun, *Bian chuang yu jian chang: Kiao-lology de guan nian*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4); “Traveling Theory or Kiao - ling of Ideas: A Focusing on Edward W. Said and Georg Lukcas,” in *Qiaoyi*, Vol. 1, ed. Ye Jun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14), 263; “‘Book Travel’ and ‘Knowledge Kiao-ology’ - The Companionship and Academic Interests of German Scholars and Chinese Scholars in the History of the Diffusion of Yongle Encyclopedia,” *International Sinology*, no.2(2016): 154-164.]

重要方式。

## 知识侨易与李提摩太初期的传教活动

1870年，李提摩太抱着优越的基督教至上理念来到中国。这种理念一方面体现在其编辑宗教读物的方法上：为适应山东青州的传教需要，李提摩太曾在1875-1876年间编过一本《教义问答》的小册子，他从英语和威尔士语的教义问答书中“选择了一些最好的，又加上了一些对中国人的良心有吸引力的问题和答案”，同时删除了中国小册子当中的“偶像崇拜成分，插入了对惟一真神的信仰的内容”。<sup>①</sup>这种编辑策略固然显示出李提摩太因地制宜的传教方法，甚至还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其宗教思想的包容性，但其为基督教独尊的心态也是比较明显的。

这种心态还体现在其对伊斯兰教的态度上。1875年，李提摩太在拜访山东青州的一位阿訇毛拉之后意识到，先前为宣传基督教所准备的说辞在面对伊斯兰教徒时毫无用武之地。“凡我所能引用的预言，他们都能举出相似的例子来针锋相对；而针对我提到的每一项奇迹，他们都能举出一百条来分庭抗礼”。<sup>②</sup>换句话说，在李提摩太眼中，基督教与伊斯兰教所使用的是一套相似的话语，因此，仅从话语的内部进行辩论，是无法说服对方的。

李提摩太的初期传教方式比较灵活、随意。他在乘马车前往当时的奉天旅行时，“满载着《福音书》和宣传教义的小册子”，沿途出售这些宗教读物。<sup>③</sup>此外，李提摩太还会把小册子作为见面礼，在外出拜访地方人物时赠送出去。<sup>④</sup>李提摩太在小礼拜堂、街头、集市和诊

<sup>①</sup> 除此之外，还编了一本选有三十首赞美诗的诗集。参见李提摩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第75-76页。

<sup>②</sup> 同上，第69页。

<sup>③</sup> 同上，第22页。

<sup>④</sup> 李提摩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第32页。

所等各种场所布道，<sup>①</sup>在稍后的赈灾过程中他的布道方式才慢慢显示出一些组织化的痕迹。他一边赠予饥民食物，一边送给所有的问询者《教义问答》和《赞美诗》等小册子，或者一些其它的海报，惟一的条件是他们要把这些内容背诵下来。这些人回到家以后，就会把书里的内容讲给邻居听。于是，以这些人为中心又会有许多新的前来问询的人。周而复始，宗教知识触及的群体越来越大，这些人也成为了教堂的核心。<sup>②</sup>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李提摩太就吸引到超过两千名对基督教感兴趣的人定期举行集会，并在山东境内形成了数十个中心。<sup>③</sup>

在青州期间，李提摩太还萌发了一个日后对其传教事业产生深远影响的想法：宗教思想具有一定的时效性。根据回忆录记载，青州一位年长的阿訇经常拜访李提摩太，喜欢引用阿拉伯和波斯权威的话支持自己的观点，批评李提摩太的观点。对此，李提摩太劝其以后不要引用这些人的观点，理由是“他们的知识在现时代已经被超越了”，而李提摩太本人更是在许多这些权威“从来不了解的国度里”旅行过，研究过他们的宗教制度，熟悉不同种族在生活与习俗上的细微差别。之后，这名阿訇服膺于李提摩太，成为“以追求上帝为快乐的虔诚的灵魂之一”。<sup>④</sup>李提摩太认为，这标志着自己传教方法的一个新的出发点。笔者认为该事件的影响不止于此。引入时效性折射的正是李提摩太对19世纪知识快速更新迭代的能动反映。通过将宗教思想与时代紧密绑定，李提摩太实际上巧妙地把永恒性从真理身上剔除，而一旦失去了永恒性，真理也就变成了知识，一种会不断更新，更是会过时和失效的存在。笔者想要指出并在接下来的小节中阐明的是，李提摩太对时效性这一理念的挖掘并未如其所说仅仅停留在传教策略的层面上，而是成为其后来宗教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

<sup>①</sup> 李提摩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第32、35页。

<sup>②</sup> 同上，第86页。

<sup>③</sup> 同上，第87页。

<sup>④</sup> 同上，第70页。

同样值得指出的是，李提摩太在1873年时已注意到中国教育制度独特的运作形式：全国一共有约1400个县，每个县的学者每年都要参加“升学”考试。这些考试先是在全国各地举行，考试通过的会被授予秀才的头衔。接着，这些秀才会从家乡汇聚到各自的省会城市，参加会试，通过的人会获得举人的头衔。虽然李提摩太此处并未直接提到殿试，但他应该是知道此项事务的，因为他总结道最开始参加考试的一万两千名考生当中，只有最优秀的95名能获得最终的“学位”。虽然此时李提摩太尚未对这一运作结构形成具体的想法，但这一萌芽在其心中扎根，并在若干年后李提摩太革新传教方式上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 从地上到天国：双重的危机

李提摩太对知识时效性的进一步思考应放在19世纪80年代从地上到天国的双重危机的宏大时代背景下进行考察。地上的危机指的是1870年代中后期中国北方发生的大面积饥荒和人口死亡。在赈灾过程中，李提摩太充分意识到“现世”的知识在实现中国的转变上所能起到的重要作用。天国的危机指的是1880年代帝国主义国家内部世俗力量与宗教神权以及传教团体之间不断涌现的利益冲突。这种现象也迫使李提摩太寻求一种能够应对“神圣”内部隔阂的新方法。

丁戊奇荒之后，李提摩太开始系统地更新自己的知识体系，用“新出版的书籍、最先进的仪器把自己武装起来”。<sup>①</sup>他意识到赈灾物资只能缓解部分灾民的生存状态，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sup>②</sup>只有

<sup>①</sup> 李提摩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第136页。

<sup>②</sup> 需要指出的是，李提摩太在晚清的赈灾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要求新入会的中国信徒“从今以后必须誓愿把以下要求作为侍奉上帝的特别途经”，一共8条，其中有6条都是关心与照顾现实生活中遭遇困难的人，比如“抚慰遭受麻烦的不幸者”，“看望和治疗病人”以及“关怀老人、寡妇和孤儿”。随后，李提摩太又将这些基本原则融入了给英国浸礼会总部的报告中去，希望后者能够“立即赈济灾荒”，并指出这是上帝给了英国教会“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向中国人表明真正的基督教，无论

科学的知识才是唯一的出路：“通过这种方式，我就能影响他们去修建铁路、开掘矿藏，以避免饥荒再度发生，去把民众从赤贫之境解救出来。”<sup>①</sup>意识到这一点之后，他不再独尊新教，而是广泛地阅读各种神学著作。这其中既包括马克斯·缪勒编纂的全套《东方圣书》、佛教《三藏》，还包括当时兴起的比较宗教学著作，“以免自己成为一个偏颇的基督徒”。<sup>②</sup>除此之外，他还收集了《大不列颠百科全书》《钱伯斯百科全书》以及“天文学、电学、化学、地理学、自然史、工程学、机械学”、亚洲文学、各地区民族历史等方面的著作，使自己成为一个对不断涌出的新知与现实有所了解的人。<sup>③</sup>

正是在这种有意识地调整自身知识结构的努力，使李提摩太得以及时深度地介入中国改革与近代化的进程之中。比如，他曾建议丁宝桢在中国开采矿产，兴办棉纺；建议曾国荃修建铁路，以便控制饥荒；建议李鸿章、左宗棠以及外务部引进现代教育，指出这是使中国免于战争和被勒索的途径；向张之洞介绍了由贝西默在钢铁冶炼方面的发明所引发的工业革命并建议在山西引进炼钢的设施设备，为中国即将建设的铁路生产钢轨；他甚至建议赫德向朝廷提议，组织代表团，由一位亲王率领政府高级官员，做一次环球旅行考察，了解其他国家的发展状况。<sup>④</sup>

除此之外，李提摩太还将新知列入新一代传教士的培养课程之中。在1885年的《更高质量的中国传教士》(Higher missionaries for China)一文中，李提摩太归纳了传教士应当具备的13项标准，其中知识(Knowledge)位于第3位，居自我奉献(Self-sacrifice)之上<sup>⑤</sup>。

对这个民族整体还是对任何个人来说，都是“上帝的祝福”。李提摩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第103-104页。

<sup>①</sup> 同上，第136页。

<sup>②</sup> 同上，第137页。

<sup>③</sup> 同上。

<sup>④</sup> 李提摩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第168-169页。

<sup>⑤</sup> Timothy Richard, “Higher Missionaries for China,” *Eunice Johnson Collection on Timothy Richard (RG 232)*, Special Collections, Yale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Reel 57.



他认为，新的传教士，除了熟悉宗教教义之外，还要学习地理、历史、教会史等方面的课程。这其中，他所开设的中国秘密社会课程，是在华其他福音派传教士群体中绝无仅有的。<sup>①</sup>他认为，传教士如果能够掌握一些铁路、运河、矿产、机械制造等知识，就有机会在中国进行全面变革的关键时刻迅速地被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精英接纳。<sup>②</sup>

可以说，李提摩太之所以能够全方位地参与中国的改革努力，与其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先前知识体系的不足并积极主动进行调整是分不开的。接下来，笔者还将指出，李提摩太转向新知以及新的传播方式，并不仅仅是为了更好地推行福音，更为重要的是回应福音传播中新出现的巨大危机。

19世纪下半期，随着新福音运动的展开和中国门户的开放，大量的传教士进入中国，传教士所属宗教团体之间的矛盾也迅速激化。1881年，李提摩太与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负责人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 1832-1905）就内地会与浸礼会传教的地盘划分问题发生矛盾，双方不欢而散。<sup>③</sup>虽然后来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但各派之间的分歧依旧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

与此同时，在帝国主义国家内部宗教与世俗事务之间的隔阂也在日渐扩大。在福音联盟成立之后，李提摩太回到欧洲，同德国教育部长进行了会谈。他告诉教育部长，“很希望了解最好的教育制度”

---

<sup>①</sup> Timothy Richard, “Higher Missionaries for China,” *Eunice Johnson Collection on Timothy Richard (RG 232)*, Special Collections, Yale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Reel 57.

<sup>②</sup> Ibid.

<sup>③</sup> 李提摩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第130页。李提摩太曾在回忆录中提到，1858-60年间有一场宗教复兴运动，“像燎原之火一样”，席卷了美国、英国和部分北欧国家。他本人也是在这场运动中接受洗礼，成为一名基督徒，并在不久后立下决心做一名海外传教士。实际上，和他一样立此志向的年轻人不在少数。在此之前，中国境内共有20个新教协会传教。到了19世纪初，宗教协会的数量增长到了130个。相关研究可参考Rosenkranz Gerhard, *Die christliche Mission: Geschichte und Theologie* (Munich: Chr. Kaiser Verlag, 1977), 210。转引自David Jacobus Bosch, *Transforming Mission: Paradigm Shifts in Theology of Mission* (New York: Orbis Books, [1991]2011), 588。

并介绍到中国，后者“非常生气地”喊道：“当你把中国人都教育好了后，我们该怎么办？”李提摩太又到巴黎，打算会见法国的教育部长。部长不在，但有人告诉他教育部长“恨不得把官方教科书中所有有关上帝的字眼全部清除”。<sup>①</sup>李提摩太后来与浸礼会领导层交谈时感慨道：“在我看来，这个世界最需要的，是成立一个协会，以便将那些所谓的基督教政府的官员转变为基督徒。”<sup>②</sup>这表明，虽然传教士在海外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合作与各帝国主义之间的勾结交相呼应，但这种合作，尤其是传教士与政治势力之间的合作，在回到宗主国之后又变得极其脆弱。<sup>③</sup>

甚至在浸礼会内部，李提摩太在中国的一些做法也遭到非议。比如，上文提到李提摩太正视中国本土宗教中的一些合理性。他还发表过一本关于道教的小册子，指出道教的某些真理性，当然也强调了基督教的更加高明之处。但这种做法在某些浸礼会传教士眼中，“简直就是罪大恶极的异端邪说，我传教的方式也被认为是绝对不可接受的。”<sup>④</sup>实际上，不可接受的不仅仅是他对基督教以外的宗教的看法，还包括他为整个传教事业所规划的蓝图。1885年，李提摩太回到英国，参加英国浸礼会年度大会，并在会议期间建议委员会采用新的方式宣传福音，尤其强调了在各省省会设立大学堂（University College）。不过，浸礼会总部并未批准该建议。

相比于地上的危机，天国内部的危机是更难以用传统的方式予以解决的。当得知浸礼会总部的决定之后，李提摩太并未气馁，反而认为这是“上帝打算让我单独承担十字架的重量”。不久，李提摩太便退出了浸礼会，走上了独自探索新的传教方式的道路。<sup>⑤</sup>李提摩太后

---

<sup>①</sup> 李提摩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第179页。

<sup>②</sup> 同上，第179-180页。

<sup>③</sup> Bosch, *Transforming Mission: Paradigm Shifts in Theology of Mission*, 260.

<sup>④</sup> 李提摩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第186页。

<sup>⑤</sup> 同上，第179页。

来回忆道，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自己开始思考，“一个人如何能够向一百万人布道，而不是在教堂里那样只能面对一千人”。<sup>①</sup>他采取的办法即是下一节所阐明的：知识的出版、复制与流动。

## 侨一易的展开：出版、复制与流动

需要指出，李提摩太并非最早推崇印刷与出版的传教士。早在半个多世纪前，曾经做过印刷匠的马礼逊就指出“中国人是读书的民族”<sup>②</sup>，“就中国而言，印刷几乎是唯一能运用的利器”。<sup>③</sup>李提摩太在19世纪80年代重提印刷议题的突出之处是他敏锐地意识到出版背后实际上是知识流通的秩序化。

李提摩太对出版的思考集中地体现在《一个人如何向一百万人布道》（*How One Man Can Preach to A Million*）的报告里。他在文中重新解释了人类社会演进的基本规律：不管是古代中国还是其他地区的文明，都以极少数人通过知识的复制与流通过来影响绝大多数人。近代更是如此。以法国为例，新兴的律师与文人为了改变现状，想到了一种新的知识组织形式——百科全书。后来的世界局势变化表明，巴黎的百科全书派所造成的轰动不仅超越国境影响了全欧洲，甚至对大洋彼岸的美国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sup>④</sup>

<sup>①</sup> Timothy Richard, *Conversion by the Million in China: Being Biographies and Articles*, Vol. 1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907), 12.

<sup>②</sup> 根据苏精的研究，马礼逊曾多次如此表述，参见苏精：《铸以代刻：传教士与中文印刷变局》，台北市：台大出版中心，2014年，第8-9页。[Cited from SU Jing, *Zhu yi dai ke: Chuan jiao shi yu zhong wen yin shua bian ju*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2014), 8-9.]

<sup>③</sup> LMS/CH/SC.2.3. D., “R. Morrison to W. Orme,” Macao, 1 December 1829. 转引自苏精：《铸以代刻》，第9页。关于印刷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可参考【美】芮哲非：《谷腾堡在上海：中国印刷资本业的发展，1876-1937》，张志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Christopher A. Reed, *Gutenberg in Shanghai: Chinese Print Capitalism, 1876-1937*, trans. ZHANG Zhiqiang, et al.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4).]

<sup>④</sup> Timothy Richard, *Conversion by the Million in China*, Vol. 1, 197-210.

李提摩太还将视角转向亚洲，指出个人通过知识的复制与流通来改变社会这一机制在欧美社会之外同样有效。以日本为例，明治维新之前，日本的重要城市出现了报纸。这为明治维新这场巨大而又平静的革命（vast and peaceful revolution）提供了重要的助力。在中国，太平天国的领袖洪秀全想要建立一个新的政权是受到了梁发《劝世良言》的影响。在李提摩太看来，虽然梁发只是马礼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门徒，但这本经他之手交给洪秀全的小册子所造成的影响可以与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相提并论，因为二者都影响了数以百万计的人口。<sup>①</sup>耐人寻味的是，李提摩太此时已经充分地意识到，洪秀全并未完美地理解（imperfectly understood）《圣经》中的微言大义。但这并不影响李提摩太的判断：即使是一小部分人，传播《圣经》里的一小部分真理，也足够在欧洲和亚洲产生几百万规模的巨大革命。<sup>②</sup>

李提摩太总结道，出版为一个人向一百万中国人布道提供了巨大的机会。具体的做法是通过请有经验的传教士撰写，以及请人翻译最好的基督教作品，使其遍布中国的学校、教堂、家庭、店铺、乡下，越快越好。李提摩太特意强调：“这是唯一一条能够向百万人布道的路”。<sup>③</sup>事实证明，这条路上的成果是显著的：“截止到1890年，西方百分之八九十关于中国的书籍以及中文的关于西方的书籍，都出自传教士之笔。”<sup>④</sup>

这篇文章发表之后不久，李提摩太赴上海接替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任广学会总干事。事实证明，广学会为李提摩太实现其“一个人向一百万人布道”的宏愿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接手广学会之后，李提摩太通过调查得出“中央和地方的高级文武官员、府学以上的礼部官员、举人以上的在职和在野的士大夫以及全国的秀才和

---

<sup>①</sup> Timothy Richard, *Conversion by the Million in China*, Vol. 1, 197-210.

<sup>②</sup> Ibid.

<sup>③</sup> Ibid.

<sup>④</sup> Ibid.

应试的书生”，一共有四万四千名。<sup>①</sup>李提摩太在济南对科举考试的观察在十多年后发挥显著作用。他提议广学会在帝国的每个省区都设立一个执行分会（executive committee），每个分会每月贡献至少一篇文章到《万国公报》或者《中西教会报》。同时，“把那些最适合启蒙中国的书籍、文章和期刊定期地送给每一个州县以及以上级别的官员，以及候补官员、山长。尤其重要的是，在一省之内的每一个秀才与举人的考试场所廉价售卖这些作品。”<sup>②</sup>李提摩太甚至想到了做广告的主意，“最好是能盖上官员们的大印，在考试时期贴在城中以作宣传”。科考结束之时围绕学会出版书籍和杂志里的主题开展有奖征文活动。<sup>③</sup>很明显，李提摩太已经意识到，中国的官僚结构本身即是一个有效的信息传播网络，将书籍发给官员们，这些知识就获得了进入既有信息渠道流通的可能。在此基础之上，他还将有资格承办科考的城市理解为信息流通的重要节点，在节点上散布信息与知识即可达到加速传播的目的。

此后，这些寄生在既有政治信息流通基础之上的做法一直延续下去。在5年之后的《中国的危机及应对方法》一文中，李提摩太将这些方法进一步细化，除了像之前一样提议把书籍分发给整个帝国的县令及以上的公职人员以及举行有奖征文之外，他还强调了在上海以及每个省的省会城市以及考试中心开设书店（每个省大概有10个这样的中心），廉价出售基督教书籍、圣经以及其它各种书籍，还要把书籍分发给每年聚集在200个中心城市的考生。根据李提摩太的数据，“平均而言，每个中心城市每年有5000人，总共也就是100万人。”李提摩太坦承，“未来中国的统治者就将从中选拔而出，”而且，

<sup>①</sup>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51页。  
[GU Changsheng, *Chuan jiao shi yu jin dai Zhongguo*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4), 151.]

<sup>②</sup> Timothy Richard, *Conversion by the Million in China*, Vol. 2, 168.

<sup>③</sup> *Ibid.* 征文的想法并非李提摩太首创，早在1872年林乐知在上海就实行过。李提摩太在其回忆录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载。见李提摩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第39-40页。

“如果能指引这些人，我们就能指引4亿的中国人。”<sup>①</sup>

李提摩太对知识流通网络的思考延续到了19世纪初期。1902年，他针对来华传教士的数量问题提出两种组织结构模式建议。第一种借鉴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结构：“那些与中国签订了条约的国家，在北京有一名代表，在每一个口岸城市有一名顾问。通过这种方式，这些条约国把自己的影响力辐射到整个中国。”第二种则是来源于中国政府的组织方式：中华帝国“分为1500个县区，每一个区域都设有一个县衙，这是真正的中国政府的基本单位。一般来说，每十个县衙之上，有一名知府负责管理。每100个县衙又组成一个省区，由总督和他的助手进行管理。然后，在所有的省区之上，是北京的中央政府。……中国政府通过大约2000名官员，不仅统治了每一个县，还统治了每个乡村、家庭和个人。”<sup>②</sup> 鉴于此，李提摩太呼吁建立一种新的传教组织形式，不以教堂为中心，而是一个与中国政府结构重合或者平行的组织，也就是说，“他们的主要中心在哪里，我们的主要中心就在哪里。我们的分区和他们的县对县、区对区、省对省是一致的。”<sup>③</sup> 李提摩太总结道：“以上种种考量，展示出来的是相比于数量，我们更需要的是传教的组织化以及科学【的方法】”。<sup>④</sup> 不管是哪一种结构，都清楚地表明，李提摩太此时已经清楚地将晚清的知识传播理解为一个庞大的空间问题，一个清晰的网络问题。而李提摩太对后一种结构的亲睐又清楚地表明，经过二十年的探索，中国经验实际上为他“一个人向一百万人布道”的事业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路径。

---

<sup>①</sup> Timothy Richard, *Conversion by the Million in China*, Vol. 2, 160.

<sup>②</sup> *Ibid.*, 188-189.

<sup>③</sup> *Ibid.*

<sup>④</sup> *Ibid.*

## 侨一易的产物：数字，一种思考和认知世界的方式

在知识抵达一百万中国人的途中，数字作为一种思考和认知世界的方式开始在李提摩太的脑海中浮现，让他从基督教的教义内部突围出来，以一种全新的、科学的眼光看待他所信仰和传播的宗教。

首先，他在论述的过程中并未使用经典神学家们对宗教的定义，反而先后列举了康德、费希特、黑格尔等一系列哲学家以及像马克思·穆勒这样的东方学家和宗教学家对宗教的看法，在最后还回到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 1832-1917），并认为他的见解最接近真相，即宗教的最小定义是有灵魂的生物心中所保有的信念（belief in spiritual beings）。至此，李提摩太已经找到了一套与二十年前和青州伊斯兰教阿訇完全不同的话语来描述和定位基督教。在这套新的话语之中，基督教远胜于其它宗教，尤其在利用科学方式从事发现、探索自然以及改变生活，创造社会财富等方面。

其次，他运用了统计学方法，通过人口数据来推行人类繁衍速度的方式，找到了基督教义中关于人类起源的自相矛盾之处。依据《圣经·创世纪》的说法，上帝创造世界的第六日，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世间第一对男女，并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李提摩太以这句标志人类起源的极具象征意义的话语为靶子指出，依据最新的统计数据，在基督纪年开始之时，罗马帝国的人口大约是5400万，中国是2000万，全世界的人口是1亿左右。到了19世纪末，全球的人口大约为15亿。根据这两组数据，李提摩太推算出，世界人口大约每450年增长一倍。依据这个增长速度，从上帝塑造亚当、夏娃这世间第一对男女，到基督纪年开始时的1亿人口，大概需要1万2千年。而按照基督年表的说法，这个时间是远比1万2千年短的。李提摩太指出，既然《圣经》中提供的时间线与科学估算的时间线无法耦合，那么必须抛弃旧的年表，以新的取而代之。他强调，新的时间线建立在确定（ascertained）的、最新的（latest）数据基础之

上。而依据最新的人口数据，李提摩太争论道，欧洲在1800年是1.75亿，到了1890年达到3.5亿。也即是说，如果以最为真实准确的欧洲人口数据为基准，那么全世界人口数据每90年增长一倍，也即是每十年增长8%。这则数据表明，19世纪的人口增长速度是基督纪年以来平均增长速度的5倍以上。也即是说，基督纪年以来，世界人口的增长速度很可能是越来越快的，而非相反。总而言之，在李提摩太看来，《创世纪》中对人类诞生时刻的描述，无法通过数据的考验。

李提摩太高超的数字调遣技术大量地出现在他1890年代的其他作品中。依旧以人口为例，中国的人口是为数不多的成为李提摩太思考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的一个数据。在天津《时报》任主笔期间所作《上谕各国使臣定期朝见谨书于后》一文中，李提摩太指出，“中国每年新添人民不下四百万，以十年计之，即有四千万。各省产业如常，生之者寡，食之者众。中国衰衰，诸公但知物力维艰，而不设法变通，以求阜财之道。虽欲民生不困，势必不能。”<sup>①</sup>李提摩太认为，中国人口增加的速度太快是导致中国日益衰弱的根本因素。在另一处，中国每年新增人口由上文的“不下四百万”变为了“三到四百万”（3 or 4 millions per annum），没有变化的是他的基本观点：中国政府无力为增长的人口服务，“使得数以百万计的人在原本可以防御的洪水、灾荒和叛乱中周期性地死亡。”<sup>②</sup>还有一处，中国的人口增长又变为了大约三百万（about three millions annually）。<sup>③</sup>四百万这个数字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间呈现出巨大的波动性，呈现出不同的思路，但共享了一个问题意识：中国的问题，在李提摩太的眼中，已经转化为了一系列数字的问题。

<sup>①</sup> 李提摩太：《上谕各国使臣定期朝见谨书于后》，李提摩太著：《时事新论》，王雨校注，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21年，第4-5页。[Timothy Richard, “Shang yu ge guo shi chen ding qi chao jian jin shu yu hou,” in *Shi shi xin lun*, annot. WANG Yu (Guangzhou: Southern Daily Press, 2021), 4-5.]

<sup>②</sup> Timothy Richard, *Conversion by the Million in China*, Vol. 2, 168.

<sup>③</sup> *Ibid.*, 103.



在面对不同的人群时，李提摩太对自己所从事事业的解释或有不同，但不管是面向传教士群体，抑或是中文读者，数字都在李提摩太的写作中占据了核心的位置，成为说理和呈现现实的关键手段。李提摩太还有意识地生产、收集和使用数据。1884年李提摩太从北京取道张家口回山西，随身携带了一个空盒气压表，测量并记录沿途的海拔高度，希望这些数据能够帮助山西的地方官员修筑铁路。<sup>①</sup>1894年结集出版《时事新论》一书附上《时事新论图说》，其中不乏基于各国人口、电报里数和兵船数量绘制而成的柱状图。李提摩太口中的知识已经在不知不觉间经由网络变成了由数字组成的信息群。这些信息同时还表明，李提摩太在自觉地利用自己作为不同网络系统的节点这一多重身份收集、整理和加工在各网络中流动的信息，以便投入到下一轮的流通之中。

## 总结

笔者通过数字梳理李提摩太宗教思想和传教方式的变化轨迹，探索以数字为代表的现代知识及思考方式在其中扮演的作用。数字之诞生是知识复制、叠加与流通的结果。出版则是促使知识转化成数字，发挥作用的关键所在。此外，李提摩太的宗教思考包含了两条思路：第一条以出版为核心，延续马礼逊的印刷技术革新，打开新的宗教传播渠道。第二条以数字为核心，推出新的知识生产与流通方式。

李提摩太领导下的广学会对帝国既有信息网络的寄生与利用，照亮了学界讨论中的一处盲点：在以电报、铁路以及航运为血脉的信息流通网络建立之后，旧有的信息网络究竟是否还继续有效，以及新旧两种网络之间又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sup>②</sup>李提摩太在19世纪的最后

<sup>①</sup> 李提摩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第170页。

<sup>②</sup> 相关研究可参考Yongming Zhou, *Historicizing Online Politics: Telegraphy, the Internet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以及 Anne Reinhardt, *Navigating Semi-colonialism: Shipping, Sovereignty, and Nation-Building in China, 1860-1937*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二十年所作的尝试表明，借助旧的信息网络来传播新知，实际上是经过仔细考量、试验之后而确定的颇具半殖民地色彩的一种多方势力调和之后的结果。<sup>①</sup>正是在这样的网络中，知识得以被重新思考。数字作为一种新知识形式浮现出来，反映了中国的现实需要，更引发了对传统基督教理念的颠覆以及对宗教本质的重新思考与再阐释。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或许能更进一步理解李提摩太缘何对康有为和维新变法欣赏有加。在回忆录中，李提摩太特别指出，“由于不满意朱熹这位近一千年来的权威对中国古代经典的唯物主义的解释，康有为有意根据上帝的精神特质重新注解古代经典。”<sup>②</sup>此处的“上帝的精神特质”不再指狭义的基督拯救世人，而是现代科学知识帮助人类更好地挖掘物质的潜能。如此一来，李提摩太对基督教经典教义的再阐释与康有为对儒家经典的再阐释，实有异曲同工之妙。除此之外，李提摩太还将维新人士纳入到自己的传播帝国之内：“一小部分智力突出且强大的群体，肯定超过了一百万，成为我们所播种的新想法的信徒，并成立了强学会，在1895-1898年间搅动了整个帝国。”<sup>③</sup>这其中固然有自夸的成分，但在笔者看来，其核心要点是李提摩太将维新变法视作一场旨在通过改变知识的传播方式来实现政治变革的巨大实验，在一个新的维度赋予了这场运动全球性的意义。

---

<sup>①</sup> 程丽红有远见地将广学会称之为传播帝国，参见程丽红：《晚清政治运动中的广学会——一个传播帝国的落寞》，《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1年第1期，第214-223页。[CHENG Lihong, "Wan qing zheng zhi yun dong zhong de guang xue hui - yi ge chuan bo di guo de luo mo," *Jilin University Journal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no.1(2021): 214-223.]

<sup>②</sup> 李提摩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第233页。

<sup>③</sup> Timothy Richard, *Conversion by the Million in China*, Vol. 1, 12.

## 参考文献 [Bibliography]

## 西文文献 [Works in Western Languages]

- Bosch, David Jacobus. *Transforming Mission: Paradigm Shifts in Theology of Mission*. New York: Orbis Books, [1991]2011.  
*Eunice Johnson Collection on Timothy Richard* (RG 232). Special Collections. Yale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 Liu, Lydia H. *The Clash of Empires: The Invention of China in Modern World Making*.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 Reinhardt, Anne. *Navigating Semi-colonialism: Shipping, Sovereignty, and Nation-Building in China, 1860-1937*.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 Richard, Timothy. *Conversion by the Million in China: Being Biographies and Articles, 2 Vols*.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907.
- ZHOU Yongming. *Historicizing Online Politics: Telegraphy, the Internet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中文文献 [Works in Chinese]

- 程丽红：《晚清政治运动中的广学会——一个传播帝国的落寞》，《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1年第1期，第214-223页。[CHENG Lihong. "Wan qing zheng zhi yun dong zhong de guang xue hui - yi ge chuan bo di guo de luo mo." *Jilin University Journal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no.1(2021): 214-223.]
-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GU Changsheng. *Chuan jiao shi yu jin dai Zhong guo*.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4.]
- 何伟亚：《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刘天路、邓红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Hevia, James L. *English Lessons: the Pedagogy of Imperialism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Translated by LIU Tianlu & DENG Hongfeng.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07.]
- 李提摩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侯林莉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Richard, Timothy. *Forty-five Years in China*. Translated by HOU Linli. Tianjin: Tianj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Press, 2005.]
- 【美】芮哲非：《谷腾堡在上海：中国印刷资本业的发展，1876-1937》，张志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Reed, Christopher A. *Gutenberg in Shanghai: Chinese Print Capitalism, 1876-1937*. Translated by ZHANG Zhiqiang, et

al.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4.]

苏精：《铸以代刻：传教士与中文印刷变局》，台北市：台大出版中心，2014年。[SU Jing. *Zhu yi dai ke: Chuan jiao shi yu zhong wen yin shua bian ju*.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2014.]

叶隽：《变创与渐常：侨易学的观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YE Jun. *Bian chuang yu jian chang: Kiao-Iology de guan nian*.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4.]

叶隽：《“典籍旅行”与“知识侨易”——两册〈永乐大典〉迁移史中表现出的中德学者交谊及其学术兴趣》，《国际汉学》，2016年第2期，第154-164页。[YE Jun. “‘Book Travel’ and ‘Knowledge Kiao-Iology’: The Companionship and Academic Interests of German Scholars and Chinese Scholars in the History of the Diffusion of Yongle Encyclopedia.” *International Sinology*, no.2(2016): 154-164.]